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 清代漕粮征派与 地方社会秩序

QINGDAI CAOLIANGZHENGPAI YU  
DIFANG SHEHUIZHIXU

吴琦 肖丽红 杨露春 等著

# 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 清代漕粮征派与 地方社会秩序

QINGDAI CAOLIANGZHENGPAI YU

DIFANG SHEHUIZHIXU

吴琦 肖丽红 杨露春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吴琦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0471 - 9

I. ①清… II. ①吴… III. ①漕粮—关系—社会秩序—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K249.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8521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5.25  
插页 2  
字数 427 千字  
定价 9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S014）研究成果

# 目 录

绪 论 .....	1
一 研究缘起：作为一项国家事务的清代漕运 .....	1
二 相关研究述评 .....	4
三 概念与理论方法 .....	22
四 思路、观点与创新 .....	26
五 研究分工说明 .....	27

## 上 编

第一章 清代漕粮征派体系 .....	31
一 清初漕运的恢复 .....	31
二 清代漕运的定制与组织 .....	34
三 清前中期漕粮征派方式 .....	42
四 清代征漕中的规制之弊 .....	55
第二章 晚清征漕秩序的重建 .....	69
一 清中后期漕粮折征的趋势 .....	69
二 晚清各省漕粮折征 .....	77
第三章 蠲（免）缓（征）改折 .....	105
一 漕粮蠲（免）缓（征） .....	106
二 漕粮改折 .....	122
三 漕粮折征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129

第四章	清代的漕粮仓储 .....	135
一	漕粮仓储及其功能 .....	135
二	清代漕粮仓储的社会意义 .....	147
第五章	清代的漕粮截拨 .....	151
一	清代漕粮截拨政策、方式及用途 .....	151
二	清代漕粮截留的时空特征 .....	156
三	漕粮截拨的社会功能及其意义 .....	166
第六章	清代漕粮的平糶赈济 .....	174
一	京畿及各直省的漕粮平糶与社会赈济 .....	174
二	清代漕粮赈糶的时空特征 .....	187
三	平糶赈济与社会制衡 .....	195
附录	保水济运与民田灌溉——清代山东漕河水利之争 .....	200
一	山东漕河与民田的水利矛盾 .....	200
二	争水利、避水患——山东漕河与民田的水利之争 .....	203
三	河南卫河流域的水利争夺——与山东漕河相对照 .....	207

## 下 编

第七章	清代闹漕的地域性差异与阶段性特征 .....	215
一	清代闹漕案件 .....	215
二	地域性差异的原因 .....	222
三	阶段性特征 .....	229
第八章	漕案参与者的成分及动机 .....	233
一	视漕为利藪抑或秉公办漕：闹漕中的州县 .....	233
二	利益追逐中的特殊阶层：闹漕中的地方势力 .....	244
三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奈：闹漕中的民众 .....	253

第九章 方式与角色互动 .....	263
一 法内路径：漕控 .....	264
二 法外路径之一：个人日常的反抗 .....	285
三 法外路径之二：集体公开闹漕 .....	303
第十章 反抗与秩序 .....	312
一 政治秩序变动 .....	312
二 生活秩序紊乱 .....	317
三 制度调整 .....	320
第十一章 闹漕背后的社会问题 .....	339
一 民间信仰与地方治理 .....	339
二 地方政府合作问题 .....	346
三 “共域”领域地方官自主权问题 .....	353
余论：闹漕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变动 .....	357
一 闹漕对清代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 .....	357
二 闹漕与地方社会规范运行 .....	360
三 闹漕与社会冲突、无序状态的控制 .....	362
参考文献 .....	365
后 记 .....	398

# 绪 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漕运置于经济的范畴，从经济制度或赋税财政的层面展开研究。然而，漕运，尤其是清代漕运，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漕运指令自朝廷下达之后，即对地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在地方社会形成种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与纠葛。因此，对于漕运在地方社会运行的考察，只有完全应该纳入国家事务的范畴，才能使我们更准确、有效地理解漕运的本质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 一 研究缘起：作为一项国家事务的清代漕运

清代漕运成为朝廷在地方持续最久、最具规模的活动。作为一项国家事务，清代漕运具有鲜明的特征与属性，这些特征与属性决定了清代漕粮征运在地方社会运作中的基本走向及其社会意义。

### （一）清代漕运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清代，漕运的政治意义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漕粮被称为“天庾正供”、“朝廷血脉”<sup>①</sup>，这种意义在朝廷的反复强化之下，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共识，正如一些官员所言：“京师满汉军民所仰给者，东南数百万漕粮也”<sup>②</sup>；“国之大事，惟兵与漕”<sup>③</sup>；漕运“为一代之大政”<sup>④</sup>，乃“天下之大命所系”<sup>⑤</sup>，等等。官员们把漕运看得如此之高，如此之重，确是其他事务（包括田赋）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

① 光绪《户部漕运全书》卷一《兑运额数》。

② 同上。

③ 林起龙：《请宽粮船盘诘疏》，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二十一》。

④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五《国用考·漕运》。

⑤ 郑日奎：《漕议》，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户政二十二》。



义上说，漕粮征运便不能以一般事务视之待之，各级政府以及相关官员必须高度重视。当然，仅仅在朝廷、官府形成这种共同的认识远远不够，重要的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社会的一致认识，上下动员。

## （二）清代漕运有严密的制度保障

并非所有的国家事务都有制度的保障，清代漕粮征运不仅有制度的保障，而且相关的制度极为严密且成熟。清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八省承担漕粮的完纳任务，漕粮总额为400万石，各省府州县承担的漕粮数额基本固定，并且需实物缴纳。为了完成这一额定的漕粮征运任务，清代政府在继承与改进的基础之上，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漕运制度。清代通过规模庞大的文册《户部漕运全书》，全面记载漕运制度——雍正十三年，经御史夏之芳奏准，清政府纂辑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并例定每十年纂办一次。漕运全书的内容涉及漕粮额征、征收事例、兑运事例、通漕运艘、督运职掌、选补官丁、官丁廩粮、计屯起运、漕运河道、随漕款项、京通粮储、截拨事例、采买搭运、奏销考成，等等；每一大项制度还包括多方面的子项，完全涵盖了漕运事务的各个方面，充分反映了清代漕运制度的全面和严密。乾隆中期，清廷还曾有督漕杨锡绂负责编纂的《漕运则例纂》，也是对清代漕运制度的全面记载。此外，清政府还通过“例”的形式，不断地弥补制度在针对具体问题时的不足与缺陷。

从理论上讲，受到制度全面维护的漕运事务在地方社会的运行中，具有权威性和威严感，并具有很好的防护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然而，形式上的完善并非运行中的实效。比如，由于清代漕运制度本质上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其缺陷越来越明显，于是，“例”的制定也越来越频繁，“偶有未善，即设一例，究竟法立弊生，所除者一二人之弊，而所苦者多矣”。<sup>①</sup>

## （三）清代漕运具有强烈的指令性

指令虽然也属于制度的范畴，但一般的制度性内容主要是一种规定性，而指令则带有明确的强制性。这种指令性充分体现了漕运这一国家事务的政治特性。

清代漕运的指令性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下列数端：清代漕粮有正

<sup>①</sup> 陈宏谋：《论漕船余米疏》，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二十一》。

米和耗米之分，正米是按田地科则征收的正项漕粮，有漕各省共征收400万石。其中，运抵北京仓库的称为正兑米，运达通州仓库的称为改兑米。各省正、改兑米数额为：江南（江苏、安徽）150万石、29.44万石；浙江60万石、3万石；江西40万石、17万石；湖广（湖北、湖南）25万石；山东28万石、9.5万石；河南27万石、11万石。<sup>①</sup>耗米依据正米征收，每石加耗按照各省距离京城、通州的远近而有所差别，每起运本色正粮一石，加耗三斗、四斗不等。耗米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漕粮的正、耗以及种种附加税银米的数额都是国家规定的，各省及其下属的府州县在漕粮的征派中，照章办理，按照朝廷下达的指令执行。清代漕粮征收的粮食类别也有具体规定，江南江宁、安庆等十六府州征收粳糯粟米，苏、松、常、镇和太五府征收粳米和糯米，但皆以粳米为主；浙江杭、嘉和湖三府征收粳米和籼米，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征收稻米兼收糯米，山东、河南两省征收粟米和麦豆。虽然说粮食种类的确定依据了各地的主要生产品种，但品种的确定与征收充分体现了朝廷的意志。

漕运中所体现的强烈的指令性，充分反映了漕运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贯穿着浓厚的国家意志与官府行为。指令是制度的一部分，不可变动，但指令更具有强制的特性，必须执行和完成。因此，对于地方社会而言，漕粮征运中指令性的内容意味着一种无法改变的、被迫接受的巨大压力和负担。

#### （四）清代漕运始终处于高成本运行状态

漕运从南到北，每年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才能完成一次完整的征运。然而，朝廷对于这一国家事务的运行成本，从来鲜有计算和节制，仅有一些官员进行过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关于一石漕粮运抵北京的成本，时人也有估算和理解。黄梦维在《停漕论》中则估算，“通盘筹算，非四十金不能运米一石入京仓”。<sup>②</sup>另有记载：“惟起运本色每正粮一石，加耗三斗、四斗不等。此外，既有补润、加赠、淋尖、饭食等米，又有踢解、稳跳、倒箩、舱垫等银，在旗丁则有行月，在船只则需修理、打造，在起纳则多轻费、席板，而衙役之需诈与粮里之藉端科扰，水次之挑盘脚价，犹不与焉。总计公私耗费，共需粮一石五六斗，

① 各漕额数据依据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十六。

② 李作栋：《新辑实务汇通》卷六十七。

银五、七钱各不等，方得兑发一石正粮。”<sup>①</sup>

无论是按照哪一种估算方法和数据，朝廷每年须完成 400 万石漕粮的征运，耗费的钱粮数额十分惊人，成本巨大。其实，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也是应该计算进去的。漕粮的征派对象绝大部分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对于他们，时间和人力都至为重要。

漕运所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政治性意味着漕粮征运的重要性，但高度的重视通常导致对于事务成本和具体问题的忽略，严密的制度意味着保障和规范，清代的漕运制度把诸多人事因素（诸如漕运官员的职权、地方士绅协助征漕等）都纳入该制度体系的保护之中，这些因素既包括官府的，也包括民间的；既包括各级官员，也包括地方社会力量。而在漕运活动的运行中，制度恰恰为各方官员和地方力量提供了共同“侵漕”的机会；而强烈的指令性意味着地方社会的被动状态，没有任何理由的执行和完纳；高成本则意味着地方社会的巨大代价，这不仅把广大的农民直接推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而且影响地方社会的发展，并致使地方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

## 二 相关研究述评

“清代漕粮征运与地方社会秩序”这一课题涉及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广泛，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条缕和梳理。

### （一）20 世纪的清代漕运研究

国内近代意义上的漕运研究始于 20 世纪上半期，但成果甚鲜，诸如杨文煊、万国鼎、李文治、董继湖等学者的有限论著，主要集中在漕运的演变与漕运制度的研究上。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国内的漕运研究出现断层，研究成果十分乏见。而此期的日本，以欣顿、山口迪子、星斌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于中国漕运展开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其中星斌夫对于中国漕运进行了十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推出了专著《大运河：中国的漕运》。<sup>②</sup>当然，此期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多限

<sup>①</sup> 《漕运全书》卷二《漕粮原额·历年成案》。

<sup>②</sup> 近藤出版社 1971 年版。

于对漕运制度的梳理。但较之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的漕运研究，视野有一定的拓展，比如对于清代漕运与船商关系的探讨。

20 世纪 80 年代，漕运研究的文章渐多，但零散而缺乏系统研究，其中有不少成果并无延续性。90 年代中期以后，漕运研究逐渐拓展，学者们对漕运政策、漕粮征收、漕运管理、漕运的功能、漕仓管理以及漕运组织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出现了一批宏观考察和专题性研究的成果，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一时期出现了多部漕运研究专著，如李文治和江太新的《清代漕运》<sup>①</sup>、鲍彦邦的《明代漕运研究》<sup>②</sup>、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sup>③</sup>、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sup>④</sup>、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sup>⑤</sup>、陈峰的《漕运与古代社会》等。<sup>⑥</sup> 其中，大部分都涉及清代漕运问题或专门研究清代漕运问题。

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一书对于漕运在明清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明清漕运制度是维系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和重要支柱，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有效统治，也主要是通过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水运网络之漕运而实现的。

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陈峰的《漕运与古代社会》等著作皆从宏观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漕运现象与漕运问题。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一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各主要历史时期的漕运状况及其发展与演变；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则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漕运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如维护了中央的稳定，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交流、区域开发等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等等；其探讨的重心主要在于清代漕运的社会影响；陈峰的《漕运与古代社会》一书对历来较为人所忽视的历代漕运组织的演变问题及漕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有较多的论述。

李文治和江太新的《清代漕运》一书于 1993 年首版，2008 年出版修订版。清代漕运的专题研究当首推此书，该书以清代的河运漕粮为研

---

①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②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7 年版。  
 ⑤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⑥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究重点，对清代漕运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作者全面梳理了清代的漕运制度，诸如漕运官制和船制、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运道制度、运丁和屯田制度等，并论证了漕运的财政作用、赈恤功能等问题。此外，还探讨了漕运与吏治的关系、漕运与农村经济的关系以及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该著作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宏观把握，精细分析，是清代漕运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以上漕运研究的著作之外，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也不少。

关于清代漕运与社会经济关联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戴鞍钢的《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一文<sup>①</sup>论述了清代漕运的兴衰对于山东运河沿线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周祚绍的《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一文<sup>②</sup>，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清代前期漕运的作用：漕河疏浚，漕运畅通，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活跃国内的南北市场；漕运的畅通凸显了大运河“南北经济大动脉”的地位；而政府对于漕道的重视，也有助于沿线水利事业的发展。张照东的《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sup>③</sup>一文认为，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联系，南北的商业往来主要依靠漕运来进行物质的集散。清末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物资交流大动脉的功能衰退。陈峰的《简论宋明清漕运中私货贩运及贸易》<sup>④</sup>一文认为，漕运中之所以出现私货贸易，应该归结于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和宋以后漕运队伍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私贩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规模，促进了京城以及运河沿线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对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冷东的《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sup>⑤</sup>一文具体分析了漕运对临清城市兴衰的影响，临清的衰落主要是中央集权的严格行政管理和军事保护所导致的，也即落后的管理模式所促成的。

有学者专论清代漕运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吴琦的《清代漕粮在京城

---

① 《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

②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③ 《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④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⑤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第2期。

的社会功用》<sup>①</sup>一文论述了清代漕粮运送到京城部分的五大社会功用，其另一篇文章《清代湖广漕运的社会功能》<sup>②</sup>从维系和动摇现有社会秩序两个方面阐述清代湖广这一区域漕运的社会功能，涉及漕运赈灾、抚民等功能及其对于商品流通、城市兴衰等的作用。围绕着漕运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从漕运与农业经济、农田水利、军事以及漕运与社会制衡的关系等发表了系列文章。<sup>③</sup>

学者对于漕运的各环节以及存在的问题也多有涉及。殷崇浩的《叙乾隆时的漕粮宽免》<sup>④</sup>一文从蠲漕、截漕与平糶、白粮改征三方面阐述了乾隆朝的漕粮宽免；其《乾隆时漕粮宽免的原因及其作用》<sup>⑤</sup>则探讨乾隆朝宽免漕粮的原因及其作用，认为宽免漕粮有利于减轻人民的纳粮负担，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这种作用不能估计太高。俞玉储的《清代前期漕粮蠲缓改折概论》<sup>⑥</sup>一文系统地论述清代漕粮的蠲免、缓征、改折等事项。杨天宏《清政府裁漕的目的》<sup>⑦</sup>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政府裁减漕粮的目的、动机。

有关清代漕运人员研究的论文有：杨杭军的《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sup>⑧</sup>一文认为，处于漕运体系下层的旗丁之所以能够在漕运的过程中兴风作浪、危害漕运的运行与嘉道年间复杂的社会背景有关。陈峰的《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sup>⑨</sup>一文揭示了清代水手结帮活动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并分析了水手帮会如何转变为对社会产生危害的帮会及其结帮活动对社会危害表现。

早期论及罗教和漕运中的秘密结社活动的论文有：David E. Kelly, *Temples and Tributes Fleets: The Luo Sect and Boatmen's Associatio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up>⑩</sup>（《寺院与漕帮：十八世纪罗教与水手的联合》）及

① 《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②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③ 参见《漕运·群体·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⑤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⑥ 《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⑦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⑧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⑨ 《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⑩ *Modern China*, Jul., 1982.

其博士论文 *Sect and Society: The Evolution of the Luo Sect Among Qing Dynasty Grain Tribute Boatmen, 1700 - 1850*<sup>①</sup> (《宗派与社会: 1700—1850 年间漕帮中罗教的演变》)。刘伯涵的《漕运船帮中的协作与秘密结社》<sup>②</sup>一文较早地论述了漕粮帮船中的秘密结社活动。吴琦的《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sup>③</sup>一文探讨了漕运与民间秘密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关系。

学者们还关注到清代漕弊问题。戴鞍钢的《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抗漕斗争》<sup>④</sup>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分析清代浙江漕政的弊病,以及农民为减轻赋税而进行的斗争。杨杭军的《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sup>⑤</sup>一文认为,嘉、道时期,漕运主要的弊病主要为浮收与抗欠、官弊。这些弊病的直接后果是漕粮的大量霉变和漕粮数额的绝对减少,进而导致政治、社会环境的恶化。陈峰的《略论清代的漕弊》<sup>⑥</sup>一文分析清代漕粮征收中的种种弊端及其对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并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此外,还有数篇研究各省漕政的论文。戴鞍钢的《清代江西漕政述略》<sup>⑦</sup>和《清代湖北漕政述略》<sup>⑧</sup>、邓亦兵的《清代河南漕运述论》<sup>⑨</sup>三篇文章论述了清代各省漕运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并阐述了漕运对各省社会经济的影响。

关于清末漕运由河运向海运转变的问题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成果。熊元斌的《清代河运向海运的转变》<sup>⑩</sup>一文认为,清后期水道阻塞以及国家财政的匮乏致河运费用过重是导致漕粮由河运向海运转变的主要原因。张照东的《道咸时期雇商海运漕粮的得失》<sup>⑪</sup>一文分析了海运漕粮的优点在于效率的提高,而缺失在于存在严重的浮勒现象,并导致

①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6.

② 《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

③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④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⑤ 《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

⑥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⑦ 《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⑧ 《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

⑨ 《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

⑩ 《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

⑪ 《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

沿河经济区的衰败。冯超的《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sup>①</sup>一文认为，元代政府将大运河改直，为元、明、清提供了开展河运的同时又可发展海运的可能，并认为，“河运”和“海运”从没有“并盛”局面的出现，而是呈现出兴废交替的动态变化。

丁进军的《清末漕运史料选辑》<sup>②</sup>选辑了从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和《宫中朱批奏折》中的漕运史料二十五则。1995年，丁进军和叶志如在《历史档案》连续发表《道光年间海运漕粮史料选辑》（上、下），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全宗》辑录道光年间海运漕粮的史料。1996年，二人又发表《同治年间海运漕粮史料》（上、下）<sup>③</sup>一文，辑录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同治年间海运漕粮史料。殷崇浩的《〈清史稿·漕运〉补订六则》<sup>④</sup>一文与丁进军的《终清一代漕运未废》<sup>⑤</sup>一文通过史料考订，认为，有清一代漕运一直都在运行。此外，丁进军《〈清史稿·漕运〉订正一则》<sup>⑥</sup>一文对《清史稿》否认光绪二十七年清廷雇用外国商船进行漕运的记述进行了考订与纠误（不过，倪玉平在《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sup>⑦</sup>一文中也通过史料考辨对丁进军的观点进行了修正）。

除以上评介的成果之外，还有一些论文未能涉及，此不一一列举。总体来看，这些成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漕运制度层面的考察，对于漕运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等领域。

但是，已有成果对于漕运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涉及甚少，对于漕粮征派在中国地方社会、基层组织、农村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几无探究。海外学术界对于漕运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如日本学者星斌夫、西方学者哈罗德·C. 希顿（Harold C. Hiton）等皆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对漕运（尤其是清代漕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海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于漕运制度的梳理和漕运史的把握上，同时对于漕运与河道的关系、漕运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漕运所反映

①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② 《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

③ 《历史档案》1996年第2、3期。

④ 《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

⑤ 《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⑥ 《江汉论坛》1985年第11期。

⑦ 《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的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特性等，均有所涉及。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总体而言，出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原因，以往的著作对于漕运，尤其是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具体运作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缺乏细化研究，地方性材料的发掘也较欠缺，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 （二）21 世纪以来的清代漕运问题研究

进入 21 世纪后，历史学研究在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视角上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尤其是注重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将研究视角不断下移。漕运的研究也深受这一学术环境变化的影响，相关研究趋向多元化，虽然论著数量不是太多，但视角、方法、观点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拓展。

值得关注的著作有：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sup>①</sup> 一书，将清代的漕粮海运放置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环境中考察，分析漕运的政治、经济、社会特性及其相互关联，着重探讨了清代漕粮海运兴衰原因、漕运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漕粮海运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以及它和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等等；强调漕粮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是晚清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著作内容充实，全面系统，叙述细密，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专门研究清代漕粮海运的厚重之作。倪玉平、荀德麟的《明清时期的全国漕运中枢淮安》<sup>②</sup> 一书分析了明清时代的漕运中枢城市淮安在漕粮运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漕运对于淮安城市发展的影响。李俊丽的《天津漕运研究（1368—1840）》<sup>③</sup> 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天津漕运的各个方面，揭示了漕运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关系，拓展了清代漕运及城市史的研究。胡铁球的《明清歌家研究》<sup>④</sup> 一书虽然不是研究清代漕运问题的专论著作，但书中对明末清初江南负责收兑漕粮的群体的演变进行了考察，论述了歌家在漕粮收兑过程中与其他群体诸如粮长、仓夫等的关系，关于歌家与漕粮交纳市场化

①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年版。倪玉平还著有《浅论淮安与漕运的关系》（载《“运河之都”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版），也是论及淮安城市发展与漕运的关系的论文。

③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